

自治

美国民主的文化史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美〕罗伯特·H.威布 著



自 治

——美国民主的文化史

〔美〕 罗伯特·H.威布 著

李 振 广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美)威布著;李振广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100-04562-2

I. 自… II. ①威… ②李… III.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历史—研究—美国 IV. D771.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72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ì Zhì

自 治

——美国民主的文化史

[美] 罗伯特·H. 威布 著

李振广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562-2/K·868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3½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致谢	1
绪论	4
第一部分 美国例外(19 世纪 20 年代—19 世纪 90 年代)	17
第一章 民主政治	22
第二章 未开化的人	49
第三章 人民	71
第四章 进或出	99
第二部分 转变(19 世纪 9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	129
第五章 使下层阶级沉沦	134
第六章 新兴的等级制度	157
第七章 使人民分裂	184
第三部分 现代民主(20 世纪 20 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	205
第八章 个人	210
第九章 政府	229
第十章 内部的冲突	252
结论	279
注释	302
特别致谢与参考书目	316
索引	350
译者后记	367

致 谢

ix

本书的初稿是 1987 年在康奈尔大学由最和蔼可亲的迈克尔·坎曼主持的三次卡尔·洛特斯·贝克尔讲座内容的一部分。我对斯图尔特·布卢明在这一时期对我的鼓励深表感谢。简·J.曼斯、布里奇·J.诺雷尔、玛丽·贝思·诺顿、詹姆斯·奥克斯以及罗伯特·韦斯布鲁克通过指出这些演讲的缺点,激励着我去把事情做得更好。萨拉·埃文斯、约翰·海厄姆和苏珊·赫希对一篇概述了我对美国民主的另一种观点的论文做出的回应,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作为 1987 年耶路撒冷一次讨论会的评议人指责我“走的是共产主义道路”的施洛莫·阿维尼瑞,其富有想像力的批评特别值得一提。

约瑟夫·巴顿、约翰·L.托马斯和小萨姆·巴斯·沃纳忍受着原稿的粗糙,通读了本书的草稿——作为学院提供赞助的最后测试——并要求我继续这项研究。詹姆斯·T.克洛彭伯格和詹姆斯·J.希恩为后来的版本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评价,而艾伦·卡罗尔·杜波依斯对第二部分进行了全面的评价。罗宾·芒西对倒数第二版的精当评论一直指导着我对本书的最后修订。我对所有这些人的帮助深表感谢。我对罗伯特·贝拉和迈克尔·舒德森提出的见解也深表感谢。

詹姆斯·坎贝尔、阿瑟·F.麦克沃伊和哈罗德·珀金为我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原始资料。我分享了哈里·沃森对 19 世纪初期政治的广博知识,我还分享了亨利·宾福德对 19 世纪后期城市的广泛了解。罗兰·盖约特帮助我整理了我对当代民主的见解,乔伊斯·塞尔策帮助我把我的手稿编成章节。我的家人对这一项事业很感兴趣。道格拉斯·威布和理查德·P.威布推荐了一些读物。埃里克·威布和帕特里克·威布对我所认为的选举投票的优点表示怀疑。与詹姆斯·E.谢里丹和克拉伦斯·L.维尔·斯蒂格一样,托比·威

2 自治

布表示相信我最终是会有想法的。理查德·L.麦考密克、彼得·帕里什和横山亮对其中的某些想法感到激动。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凯斯林·戈尔、道格拉斯·米切尔以及里纳·拉纳利始终是富有同情心的和助人为乐的。所有这些人的贡献都在鼓舞着我。

纽贝里图书馆提供的一个劳埃德·刘易斯研究员职位,使我有时间在一所大学的环境中撰写本书的初稿。理查德·H.布朗——这家图书馆当时的学术副馆长——不断给予我极大的鼓励。斯潘塞基金会和无名捐赠者的慷慨加快了原稿完成的速度。在本书的撰写期间,鲁道夫·H.魏因加特纳和劳伦斯·B.杜马,即西北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前后两位院长,一直支持这项研究计划。我还应特别感谢史蒂文·L.贝茨、约翰·R.麦克莱恩和阿戴尔·L.瓦尔登堡,他们为确保我从休假中获得最大收益而打乱了他们自己正常的工作安排。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抱怨运气不好,但我却不能说我得到的条件太差。

此外,还有撰写这本书的无形资产以及大量其他的东西。乔·巴顿和芭芭拉·斯派克收留了一位无家可归者;佩吉·安德森、吉姆·希恩夫妇,芭芭拉·赫布·巴斯夫妇,芭芭拉·劳埃德·加德奥夫妇,芭芭拉·杰里·林德曼夫妇,以及多萝西·约翰·汤普森夫妇提供了理解与仁爱的机会。芭芭拉·赫尔特与格里·史密斯忠贞不渝地支持我;安尼塔·费尔曼见证了我正在达到预定目标;帕特·格雷厄姆为我提供的是她那种实际帮助与个人热情的无与伦比的结合。帕梅拉·洛温斯坦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心;而萨姆·沃纳与我分担了一项又一项令人讨厌的事情,对于他们的帮助,我感激不尽。

献给萨姆·沃纳

绪 论

美国人的行为似乎表明,由于民主太重要了因而是无法定义的。他们似乎要说,使民主保持足够的弹性以便容纳我们在国家生活中所发现的最好的东西。因此,在日常用法中,民主也许是指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我们相互之间的待遇;可以是指保守的、自由的或激进的经济计划;可以是指个人抵御多数人的权利或多数人抵御所有新来者的权利;可以是指有种族差异意识或没有种族差异意识的公共政策;可以是指国外专制独裁政权的垮台或国内行政权力的上升;可以是指消除差别或赞美差别等等更多的东西。作为一个无论我们喜欢什么都是必不可少的术语,民主在总体上覆盖的范围如此之大,但在细节上并不具有多少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民主太重要了而不得不对它进行定义。作为美国最突出的特点和美国对世界历史的最大贡献,民主需要经过那种现实、缜密的检验,这种检验是我们专门用于检验上述那些问题的,这些问题能够使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我参加了一场由最近几年凭自身的能力一直在把民主剖析开来以进行严格检查的人们组织的集会。我对这些会谈的贡献是特别关注美国民主的历史。美国民主是怎样降临的?美国民主与其周边的其他行为模式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几个世纪来它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它在当代美国的处境怎样?

但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要简略谈一谈民主的意义。尽管最近对民主兴趣的上升已经使这一问题充满一种新的严肃性,但却并没有使这一问题更为清晰。定义的混乱——有些是明确的,有些是含蓄的——争相吸引着

2 我们的注意力。通过利用最近 25 年来 60 多项研究精髓对民主的评论,让

我们尝试着弄懂这种混乱的含义。*

尽管最初的印象——一种重要的印象——即这 60 多种声音当中,许多观点完全是无法相互交流的,但是,我们的范例中也出现了一些意见一致的方面。首先,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民主是一个包括选举在内的自治过程。然而,几乎没有一项研究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事实上,大多数评论家一起匆匆忙忙开列了一张使选举及任何他们认为与自治有联系的其他东西合法化的条件清单。在此,复杂性开始出现了。

他们的一些条件规定了什么东西必须进入政治程序,另一些条件则规定了什么东西必须从政治程序中产生。就输入这一方面而言,前提条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具体指明了民主政治的结构,也就是宪法、法律、规则及程序;另一部分具体指明了参与政治过程的那些公民的资质,那就是信仰、承担的义务以及对于像你、我这样的人的了解。在这一过程的最后,实质性的产物分成三大类:自由,通常所指个人的自由;公正,通常集中在社会公平问题上;以及效率,几乎总是珍视那种能够快速、权威性地解决主要问题的能力。这些条件有一个极为快速的积累途径,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从这个范围中和这些因素的自然要求中猜出来的:政治结构和公民资质进入这一过程,自由、公正和效率从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究竟是谁想要一种反常的结构或一种不合格的公民?谁想要一种不公平的制度或一种摇摇欲坠的政府?各种各样的评论家为民主设置的条件越高,我们唯一的共同基础——自治过程——被埋葬得就越深。结果,民主的主题就越来越与一大堆人人都极为关心的事务相似。

乱上加乱的是,当代评论家们自身趋向于分成不同的团体——思想家,政论家,社会科学家——并且只与他们自己的同行相互交流。通常把民主当作一种道德问题的思想家们把个人置于中心地位,紧接着,在他们的争论中才涉及了民主制度本身,并强调民主的结果:他们告诉我们事情应该怎么

* 引用著作的要点是按照作者和出版时间来标注的。有关引文的全称,参见第 279—281 页(为原英文版书页码。——译者)“特别致谢与参考书目”中的绪论与结论部分。

样。也许是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新闻工作者的缘故,政治家们以公共事务中的危机为起点,把危机与民主联系起来,并设计出一份必须改革的菜单:他们告诉我们事情必须怎么样。社会科学家从政治与政府开始,在政治与政府中寻找民主,并把全部精力用于程序的改善:他们告诉我们如何使事情运转起来。当这辆汽车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时,社会科学家打开汽车发动机罩进行检查,思想家问我们想要去哪里,而政论家们则在找警察帮忙。被自由和公正问题所吸引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们,避而不谈对结构进行缜密检查的问题;相反,社会学家却把结构和效率置于优先的地位。政论家们的历史意识最薄弱:他们所称的危机几乎总是史无前例的。思想家们的历史意识最强:他们的思想几乎总有一个历史渊源。社会科学家最重视现状,思想家最不重视现状。即使不考虑包括某些参与者难以分类在内的那种不可避免的例外,三个如此根本不同的团体——各自都在进行自己激烈的民主问题讨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围绕这一主题竟有这么多不同的解决方法。

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不满意最终都是从民主的结果开始的。正像思想家罗伯特·诺齐克和法学理论家罗伯特·曼加贝拉·昂格尔可能认同的,也许个人的自由正在受到阻挠;或者像消费者利益的捍卫者拉尔夫·纳德和政治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所称的,社会正义正在被否认;或者像新闻工作者小 E.J.迪翁和政治学家詹姆斯·莫伦所主张的,政府制度正在创造出没有价值的结果。当批评家们把注意力从输出转向输入这一端时,他们几乎总是希望向其中添加某些能消除这些缺陷性结果的东西。社会学家通常偏爱政党的复兴,偏爱于竞选资金如何筹集的附加规定(这在政论家当中也很普遍),以及控制难以驾驭的立法机关的方法,诸如,允许分项否决或(政论家们和思想家们都加入进来)颁布公平合理的经济政策。一些政论家和思想家主张把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名单加长。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改变进入政治程序的那些东西以便提高这一程序输出结果的公正性或效率的替代办法。

大多数建议寻求弥补普通民众中的缺点:强大的政党是由于普通公民需要核心和领导;对竞选开支进行限制是由于选民抵御不了听起来有说服

力的宣传;授予权利是由于弱者需要得到保护以抵御强者,少数人需要得到保护以抵御多数人。政治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和 L. 马丁·奥弗比指责说,除了“被传媒和金钱所控制;除了使公民感到困惑的长长的候选人名单;除了回避真正的问题以及无穷无尽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追求轰动效应和玩世不恭之外”,选举政治还会是什么?学者摩西·芬利认为,我们在这些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是理所当然的,即公民们普遍“愚昧无知”,他们“明显缺乏前后一致性……缺乏知识,缺乏政治训练,并且态度冷漠”。弗兰克·索芬⁴夫院士甚至以一种更为尖锐的语调把美国的政治描述为“由民众的担心、民众舆论及民众投票推动的,是一种很容易被煽起激情”并被不可救药地个人化的“政治”。民众进行着顽强的抵抗。不是政府需要显示它值得得到选民的支持,而是选民需要显示他们值得受到政府的关注。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希宣称,摆脱现代社会那种把成人当幼儿看待的困惑并“显示出民主具体表现为一种要求较高的行为规范”,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罗伯特·贝拉和他的同事建议把民主体义为“一种政治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人们积极关注那些意义重大的问题”。¹

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的那种少数人讲解问题、多数人听的等级式排列的世界,在那些最怀疑民众参政资格的人当中受到特别的欢迎也就毫不奇怪了。思想家威廉·赖克把任何其他形式的民主称之为“荒唐的”和“站不住脚的”。²由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那个受到广泛赞誉的公共生活理想是以这样一种有知识的、不带偏见的并且能迅速接受理智的理由规劝的公民为前提条件的——就像亚当·塞利格曼所敏锐地指出的,哈贝马斯试图使我们的时代重新流行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像专栏作家弗洛拉·刘易斯与思想家约翰·罗尔斯这样与众不同的评论家都重申了这种理性公民的要求。

在这些讨论中,没有多少人赞成用除此之外的别的办法来治疗通常情况下发生的那些弊病。在参与者本身就是这一问题的一部分时,这种解决办法是没有意义的:“更加的民主”只是“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公共部门的混乱状态”。用政治学家托马斯·克罗宁那种权威性的说法就是,如果,而且只有

在“人民了解情况并且予以关心的情况下,才能把民主政治托付给他们”。³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会怎么样?对结果不满意助长了对输入的不满意。按照定义,从这一过程之中产生的错误结果是与输入到这一过程之中的错误的公共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民主配得上这一名称是一种品质更高的原料的必然结果。此外,一开始就要求更好结果的那些人兜了个圈子后又回到原处寻求这些结果:只有在新的结构和新的公民价值观产生出规定的或自由或公平或高效的结果时,它们才是重要的。如果公众不关注贝拉那类人认为是重要问题的那些东西,按照他们的标准,民主就是失败的。

当代批评家们用某些代名词来表示他们对现存输入与输出系统的忧虑,其中最常见的一个词就是真正地,例如,思想家菲利普·格林渴望实现一种公民“真正平等的”民主,或者政治学家詹姆斯·菲什金寻求“一种真正合适的民主类型”。⁴其变种包括对一种名副其实的或真正的民主的肯定,与当前华而不实的假民主是截然不同的;或者,从这一问题的阴暗面出发,使用像思想家约翰·邓恩的“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学家格兰·塞博恩(Göran Therborn)的“资产阶级民主”这样轻蔑的术语,这样的民主可能与请求实施一系列无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神权的和传统主义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为使我们继续对结果保持关注,其他的人就恫吓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提防的话就会出现其中最坏的结果。为防止民主发生错误的转变,政论家欧文·克里斯托尔唤起了我们对那种“邪恶的、卑鄙的、肮脏的、有损人格的”社会的一种霍布斯式的强烈反感。⁵思想家艾伦·吉尔伯特一再动不动就提出纳粹来恐吓我们。争论的结果认为,如果我们无法容忍这些令人讨厌的结果,那么,除非能够确保正确的民主制度,否则我们别无选择。

几乎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对结果、原因以及进一步结果的先入之见,缩小了介乎于两者之间的共同基础——政治过程。例如,赞同更多绝对权利的自由与公平的拥护者,公然打算对人民的政府进行控制。权利就是处于民众选择范围之外的那些授权,被法学理论家罗纳德·德沃金进一步明确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不容置疑的承诺”。在思想家艾米·古特曼向她的公正宪法模式中添加了“普遍的福利权和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之后,在众多其

他的权利当中,政府主要是行政管理性的,而选举则是仪式性的。政治程序逐渐扮演了一个朴素的因变数的角色。一位研究低水平投票的专家鲁伊·泰克西拉(Ruy Teixeira)建议,提高投票率不要扩大民众的参与而是要赋予领导人以“足够的合法性去实行人们所热切希望的政策”——除非“改革的代价不算太大”。⁶

共同的基础偶尔会完全消失。尽管几乎没有民主评论家公开这么说,但过度强调结果总是会将广受欢迎的政治程序置于危险之中。如果它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为什么还要保留它?有些定义放弃了政治程序这一概念,就像社会科学中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那些定义所显示的:对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来说,民主只是“正在运作着的美好社会本身”;对拉尔夫·达伦多夫而言,民主充其量也就是“没有革命的政治变革”。在这种安排中的民主是漂浮不定的。比如,由于没有更为牢固的精神支柱,因此,号召对我们的所有制度实行民主改革,读起来像是随意出来的一句话。⁷

一旦升空,民主就可以停留在空中。那些认为这种制度本身毁坏了其结果的评论家们,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对于思想家罗伯特·保尔·沃尔夫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对于政论家迈克尔·帕伦蒂来说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帕伦蒂与弗朗西斯·福克斯·皮文及理查德·克劳伍德都认为,事实上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曾是民主的。按照他们自己较高的标准,政治哲学家本杰明·巴伯和罗伯特·达尔持相同的看法:用巴伯的话来说,真正的民主在美国“从来没有存在过”。思想家卡罗尔·佩特曼把这一争论扩大到,“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民主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存在过;在任何已知为‘民主’的国家里,妇女从来没有并且仍然不被承认为是完整意义上的和平等的成员与公民。”⁸

也许就像威廉·格赖德所建议的,较高的标准把民主从一个社会制度转变成了“一个尚未实现的、美国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幻想”。⁹思想家约翰·德赖齐克(Dryzek)曾经更为明确地认定,一个开放的、人人平等的民主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不可否认,达尔对民主的全面论述,为任何社会都不会遇到的民众参与确立了标准:一个包括所有智力正常的成年居民在

内的选民,每一个选民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去筹划公共问题的议事日程,在决定、决策机制方面都有着平等的权利,都有平等的权利去获得与这些公共问题有关的信息,在决定解决办法方面具有同等的权利。这些理想的最高点更加突出了最终由美国与真正的、真实的、名副其实的民主之间的巨大距离所测定的、美国下沉的深度。

作为一个逻辑命题,民主的定义不需要与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有任何联系。但是通得过逻辑检验的东西却通不过历史的检验。某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发生在19世纪初期已经获得名义上民主的美国。事情一旦发生,它的影响将传向全世界。从那时起,千千万万的人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假定而活动的:民主是存在的,而民主的定义必须小心对待这一事实。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量评论中,几乎没有人估计到这种社会经验的历史。

历史意识以两种方式放宽了什么必须进入民主和什么必须从民主中产生的标准。首先,它对某些以现在的标准看对良好的民主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表示怀疑。例如,认为我们所定义的贫穷使公民丧失了资格、我们所定义的教育使公民获得资格的那些人们,没有注意到19世纪一种相反的历史记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生活水平很低而且没安全保障体系,但是美国的选民却在整个政治过程中——包括投票选举——明显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经济不景气——无数公民都曾经历过不由自主地下落的体验——似乎没有阻止任何人的参与积极性。与20世纪全面增长的正规教育所培养的选民相比,19世纪通过家庭、教堂和公立学校的教育,通过口头的和书面的大众传播交流网络的教育以及通过参与本身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选民更为坚定和自信。那些认为20世纪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特别举出现代政府难以想像的复杂性和大众传媒的思想麻痹作用的人们,显然没有注意到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指控:在大政府时代之前,在收音机时代之前,更不用提电视时代,能力不足、被人操纵的公民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惯常现象。像“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这样的说

法是文化上的人为现象,而不是科学的真理。

有关不公平地划分选区损害了民主、辱骂攻讦的竞选运动使民主受到贬损、公开拉选票败坏了民主等指责同样是有问题的。一人一票作为超越法律的代表制准则只是一种全新的强迫性观念。刺耳难听的语言经常显示出政治的重要程度。而公开拉选票通常同样也加强了表达这种强烈情感的组织纽带。在一个现代投票站外,短得令人沮丧的投票队伍会使一个 19 世纪的民主人士感到忧虑,至少,与想到 19 世纪喧闹的党派群众似乎会使今天的评论家们感到忧虑是一样的。

作为第二种较为温和的影响,历史否认了这样的观念:即民主需要证明是完美的,任何方面降低到普遍性标准之下都会使整个民主事业陷于堕落。什么样的事物曾经达到最完美的形式?只有坚持认为今天而且只有今天才揭示了真理的那种心态——一种认定今天的真理明天就过时的心态——拒绝相信其他时代的人和其他的文化在寻找他们自己的走向民主道路方面的巨大可能性。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不仅都是无用的,而且还都是错误的。别的有着其他类型价值观的社会已经创造出其他种类的民主制度。这暗示着那些有着最苛刻要求的评论家们对 19 世纪美国的民主表露出的满意程度最低。他们认为,19 世纪美国的民主充其量只能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有缺陷的预备阶段:例如,在达尔看来就是一种局部的多头政治,或者,借用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罗尼克那种轻蔑的说法,在皮文和克劳伍德看来就是现代之前的那些“宫廷与政党”。格兰·塞博恩判断说,即使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在 1970 年之前美国也是不合格的。

当然,容忍缺点是有其限度的。例如,也许白人在 19 世纪美国那种长时期内对选举权的垄断,完全超出了含义最灵活的民主所能包括的范围。然而,没有人期望广泛的成年人的公民权会在 19 世纪初期眨眼之间就能降 8 临。某些被排斥在外的情况——有些方面是因为发展,有些冲突是因为界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最初所存在的,甚至是根据现在看来似乎是无法容忍的理由而存在的被排斥在外,与后来剥夺公民曾经拥有权利的那种被排斥在外有着不同的含义。从民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剥夺公民

权比最初未能授予公民权更具有致命性。如果把这一个称为一项努力追求的目标的话,那么另一个就是一项破坏性的工作。

换句话说,感觉到历史的多样性,有助于我们把加诸于民主体义中的当代条件尽可能降到最低。这又一次使我们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共同基础——人民民主之上。民主的核心就在于此。我们应约束、控制我们的价值观以便为政治程序留下空间,而不是因为政治程序威胁了我们的价值观而把它撇在一边。

一群包括彼得·巴卡拉克、沃尔特·迪安·伯纳姆、约翰·德赖齐克、威廉·格雷德、西德尼·维巴和诺曼·尼,以及迈克尔·沃尔泽等在内的当代评论家,一直在为我们保留了这个基础。而且尽管有本杰明·巴伯和罗伯特·达尔为他们的理想世界设置了极高的规格这种事实,但他们一直是捍卫民众参与的伟人。维巴和尼以使人消除疑虑的、简明易懂的方式宣布,“如果民主被认为是由人民统治,那么……决策中的参与者越多,则也就越民主。”在沃尔泽的构想中,民主“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一场没有明确结论的争论……从没有公民宣称曾一劳永逸地说服了他的同胞”。¹⁰

这种开阔得足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历史视野的方法,恰好提供了一个简朴的民主体义。它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人民的民主。因此,它必定是政治的,而且由于它包括许多民众,所以它需要统计意见和选择以便记录人民的决定。尽管民意测验、集团要求、甚至个人的市场选择都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某种角色,但是,选举仍然是决定性的步骤,而这一步骤的保证依然是民主政治中的最重要的规则:选民中的多数人永远不得把选民中的少数人排除在选举程序之外。

仅凭投票是不够的。各种政府都举行选举。为使政治参与更加有效,公民需要信息和进行联盟的可能,这种联盟能够赋予他们进入到政治制度中来的机会,以及他们还需要对人民的决定做出响应的政府官员。除了这些进入权与做出回应的核心要求之外,民主也需要足够的运行空间。尽管民主可以在其范围之内容忍某些不民主的习俗,但是它在一个大的、敌对性

的制度环境中却无法运行。在 18 世纪的一个君主国中的镇民会议是不具有民主资格的：因为主权权力必须是民主的那种主权权力。

最后，民主是别的某种东西。当它扎下根来的时候，它会获得一系列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相符合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最终会变成这种民主的一个无法摆脱的部分。例如，在大多数 20 世纪初出现的欧洲民主国家，社会福利计划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民主制度吸收消化了那些服从的习俗、制度。然而，就像这些特征标志着每个国家的民主那种难以磨灭的特征一样，这些民主依然保留着它的从属特征。没有福利政策的人民民主仍然是合格的民主；没有人民民主的福利政策——就像许多独裁国家所表明的——却不是合格的民主。总之，民主始终是人民的民主，并且民主又是难以确定的别的什么东西——某些依附在民主之上的、文化上特有的东西。在美国，所谓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个人的自决。

历史与理论是相互作用的：使定义符合历史，用定义界定历史。如果历史提醒我们民主在许多地方、许多时代意味着许多东西，那么定义就提醒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民主什么都不是。民主不是政治经济的一个方面，它也不偏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它们的任何变体。它与许多环境的可分离性和可适应性，有助于解释它的全球性影响。民主不是一组社会结果。它没有允诺带来良好的健康、充足的休闲、上升的生活水平或收益的均等。民主并不等同于一批特定的支柱——两党政治、宪法、充满活力的新闻舆论、大量的民间社团等等。没有什么单调而重复的环境能够代理人民民主，民主也不包含消除残暴和压迫行为：它没有垄断富于同情心的冲动或社会敏感性。尽管它在理论上倾向于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原则——因此这些词在对民主的讨论中被频繁使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它没有对这些重要观念中的任何一个提供可靠的、具体的支持。换句话说，民主揭示了我们的人性，而非我们之得救。我们可以不喜欢它。

民主是处理公共事务的方式之一。历史并没有赋予它以优势地位。问为什么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或在一个特定国家不存在民主，这显然是一个歪曲性的问题。它的不存在不必给予解释。任何国家对民主的未来都不拥有